

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

·朱彦 闫树军·



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



“突发状况”时郑景康拍摄下的照片

吴印咸提议室外拍摄

常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“正片”，是由吴印咸拍摄的。

吴印咸，江苏省沭阳县人，191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。在校期间，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，自学摄影。1934年，吴印咸拍摄图片《田螺》，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。1935年，应夏衍之邀，拍摄由许幸之执导的剧情电影《风云儿女》。1938年秋，吴印咸来到了古城延安。1942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革命事业紧紧联系起来……

1942年5月，吴印咸作为延安电影团的负责人兼摄影师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。因为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的会场面积较小、室内光线很暗，与会人员较多，在这样的室内环境难以拍摄出好的作品。吴

印咸在经过实地测试后，向毛主席提议到室外拍摄，毛主席欣然同意。

散会后，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。主席先坐下，同志们很快围在了周围。在当时，没有转机，也没有广角镜头，吴印咸先从侧方拍了一张，这是测试照。随后，他又从正面依次拍了三张，在洗照片时，将三张底片连接起来，便呈现出人们熟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。这张合影照，是记录这次会议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说“唯一”，有人提出疑义：不是一张，应是好几张。的确，经多方面信息汇总，当时至少拍了四张：第一张是正面照，第二张是从左侧前方拍的；第三张是从右侧前方拍的；第四张是正面近景，这张照片上只有毛泽东等十几个人。

有人说正面近景照是大合影照片的局部截图。其实不是，因为从照片的对比上看，这一局部照片上，毛泽东右手位置

与大合影的位置是不同的。另外，田方背后的人，在大合影里是被田方遮挡了左半边脸的，而在局部照片里，是遮挡了下半张脸。

稍纵即逝的“花絮”

在吴印咸对好焦，正要按下快门时，突然，一条狗闯入了镜头。毛主席看到后，立马站起来，轰赶这条狗，并对康生喊：“康生，快管好你的狗！”浓浓的湘音把参加合照的人都逗笑了。

把狗轰走后，吴印咸再次聚焦镜头，准备按下快门。不想这时又发生了状况：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是个大个子，身体较重，小马扎撑不住他的份量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小马扎被压塌了。

这些稍纵即逝的“花絮”，被另一位红色摄影师郑景康抓拍了下来。

郑景康，广东中山人，1904年生，192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

科学学校学习。在学校期间，他还学习了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。1930年春，郑景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，开设“景康摄影室”，专门从事人像摄影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郑景康回内地参加抗战。

1941年1月，郑景康到达了延安。他留在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，成了一名专职摄影师。从1942年起，他在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，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摄影工作者。

郑景康作为摄影界的代表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，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摄影展。郑景康制作放大了数十张反映延安火热生活和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。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亲自帮郑景康策划和选择



红色里程碑

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80周年

叶淑穗：守护鲁迅文物

·费冬梅·

叶淑穗1931年1月生于北京，父亲叶梯云学习铁路专业，母亲姚秀贞毕业于广州夏葛医学院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医学女大学生之一。1949年，叶淑穗考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。1956年7月，叶淑穗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。

鲁迅文物的“活字典”

为了保管好鲁迅文物，她通读了鲁迅作品，对资料室收藏的众多鲁迅藏书、手稿和文物慢慢熟悉起来，成为鲁迅作品与文物的“活字典”。

叶淑穗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征集文物。鲁迅博物馆组织编纂内部资料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》，其中的《鲁迅手迹目录》部分由许羨苏和叶淑穗负责编辑。为了解鲁迅手稿收藏情况，在许羨苏带领下，叶淑穗开展了广泛的征集和访问工作。她走访了鲁迅的许多学生、挚友和一些鲁迅手迹收藏者，只要有线索，就一追到底。

1956年，叶淑穗第一次见

到鲁迅夫人许广平。二人都是广东人，天然地有亲近感。除了文物交接工作，许广平会和她讲家乡话，也会向她说一些对馆里工作的不满和心中的苦闷。1961年的一天，许广平高兴地告诉叶淑穗，自己已经被批准入党。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对叶淑穗也十分信任。在周海婴那里，叶淑穗既是“秘书”，也是朋友。遇到一些不想处理的信件，他便交给叶淑穗处理，有些人事信息需要问清楚，就打电话给叶淑穗，请她帮忙查找信息。

叶淑穗曾拜访过鲁迅二弟周作人，后来遇到鲁迅手稿、照片搞不清楚的地方，她就请教周作人，周作人会托鲁迅的学生常惠带解释的字条。叶淑穗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也有联络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整理周建人的口述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，手稿最初写得比较乱，周晔找到叶淑穗，叶淑穗就让爱人帮她抄了一份字迹工整的书稿。

叶淑穗还拜访过冯雪峰、曹靖华、胡风、徐梵澄、戈宝权、章廷谦、江绍原、唐弢、胡



▲鲁迅绘图、撰文的手稿《明器图像》
▲叶淑穗陪同井上靖夫妇参观鲁迅故居

愈之、萧军等人。她在向这些老先生请教的同时，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，并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。她的真诚赢得了这些先生及其家人的信任和尊重。曹靖华先生1965年给鲁迅博物馆捐献了71封半书信。曹先生去世后，曹苏玲又将曹先生自己留作纪念的9封鲁迅书信捐献给了博物馆。

从文物理解鲁迅

1976年2月，鲁迅博物馆成立鲁迅研究室，下设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编辑部、年谱组、手稿组和日记组，新任馆长李何林兼任鲁迅研究室主任，叶淑穗也转入手稿组从事研究工作。

手稿组的主要任务是

出版《鲁迅手稿全集》做准备。在复印北图所藏手稿时，他们发现了18篇鲁迅佚文。当时，很多学者不知道《两地书》还有鲁迅、许广平二人的通信手稿存世，他们及时传递了这个消息。1979年，手稿组搜集了当年能搜集到的所有鲁迅书信手稿，编辑了《鲁迅手稿全集·书信》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1981年，《鲁迅手稿全集·日记》出版。此外，手稿组还编注出版了《鲁迅致许广平书简》。这些文献为学界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对鲁迅文物的考证是叶淑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。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里“砖砚”“水盂”“书箱”“床铺”“朱安居室”“故居改造”等文物的由来及

照片，并为影展题名《抗日初期之一角》。毛主席在一个晚上由警卫员陪同，前来观看，在观展时对一些作品发表了评论。毛主席认为这些照片的最大特点是“能够抓住动态”。

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拍摄大合照时，擅长抓拍的郑景康在“外围”“捕捉”了成为历史独特记忆的瞬间。

话剧演员田方很想挨着毛主席坐，于是“抢占先机”，坐在了毛主席的左边，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，便急忙坐在了毛主席右边。

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给人直接的感觉是“形散神集”：第一排坐在马扎上，第二排坐在高凳上，第三排站着，第四排则站在条凳上，第五、第六排是把条凳放在会场门口的台阶上。背景就用开会时会场门口。这一形式上的“散状”，体现出座谈会后思想的高度聚合，从争论、意见不一，到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。而在场上出现“突发”状况时，伟人站起身大声说话，其意是大家都在照相，不要被“突发”事件搅了兴致。当马扎被坐塌，响声传来，毛主席也不由地转头看了看。这些细节，都被郑景康抓拍了下来。

（摘自《炎黄春秋》2022年第5期）

历史，她都下过一番功夫。为了介绍鲁迅书桌上的小水盂，当年她曾向许羨苏详细询问过，得知这是许羨苏赠送给鲁迅的。

叶淑穗撰写了不少文章，介绍鲁迅手稿的来龙去脉，如《萧军为鲁迅博物馆注释书信的一段往事》《鲁迅手稿在“文革”中遭江青劫掠》《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》等。

叶淑穗先生为人、为学皆讲究实事求是，对外界研究文章、图书中涉及鲁迅史料的讹误之处，她总是直率地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。为此，她撰写了《大型画册《鲁迅》的失误与失范》《对〈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〉一文的质疑》等多篇批评文章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人把一本从造纸厂废纸堆中找到的日记交给叶淑穗，希望对她的鲁迅研究有所帮助。这本民国文人日记在当前价值不菲，她却千方百计想物归原主。我考证出日记主人是商务印书馆元老伊见思先生，后又帮助联系上伊先生的亲属。2020年9月10日，叶淑穗先生和伊葆荣先生（伊见思之子）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日记交接仪式。（摘自5月9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本报法律顾问

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

张中辉 刘建民 律师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外大街10号
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9层
电话：010-83913636
网址：www.sino-law.cn